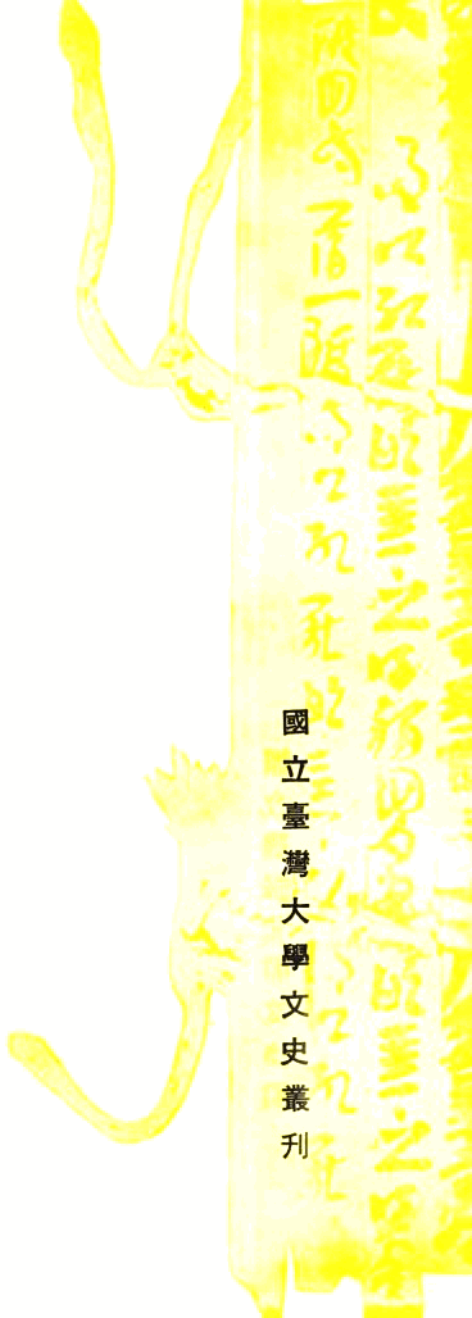


邁涅克的國家觀念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邁涅克的國家觀念

黃福得君，本校七十二學年度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本論文由徐先覺教授指導。

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 His Idea of "State"
and His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World.

by Fu-teh Huang

Histor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Series No.69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85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文史叢刊之六十九：邁涅克的國家觀念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初版

出	主	著	發	印
版	編	作	行	刷
者：	者：	者：	者：	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蔣孝璠	黃福得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藏路二五一巷八號

185元

邁涅克的國家觀念

目 錄

前言	一
第一章 邁涅克國家觀念的形成	五
第一節 邁涅克的生平	五
第二節 由世界公民主義至國民國家	一五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震撼	四五
第一節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	四五
第二節 邁向共和	五七
第三章 國家與文化的分裂	七七
第一節 國家觀念的改變	七七
第二節 文化與權力的衝突	九一
第四章 由國民國家回歸世界公民主義	一〇七
第一節 歷史主義的形成一書所代表的涵義	一〇七
第二節 德意志的災殃	一一七
結語	一四一
徵引及參考書目	一四七

前言

牟利德利希·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e）生於一八六二，卒於一九五四，是享譽於二十世紀前半世紀的德國史學家。在此先不論他在歷史研究方面的成就，而自其親身經歷來看，僅需列舉一二要事，即可明瞭他那多彩多姿與多災多難的一生：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九一八年帝國崩潰與肇建共和，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權，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四五年第三帝國崩潰。他經歷過光輝燦爛的時日，也受過兩次前所未有的苦難。納粹政權崩潰時，他已八十三歲，兀自於斷垣殘壁之中埋首苦思，探索著大災難的禍因。直至逝世前，猶秉持知識分子之良心，抱病獻身於教育工作，為培育心思健全的新生代而努力。近百的高齡，他可說是已看盡了德意志帝國的興衰起伏。若說他的一生即是一部德意志帝國的興亡史，想必不算過分。在西方，就學術研究的成就和親身經歷兩方面可以與邁涅克相比擬的學者，大概唯有克羅齊（B. Croce, 1866-1952）一人而已。

邁涅克是一位以理念史聞名於世的史學家。大學時受教於德洛依森（J.G. Droysen, 1808-1884），特萊區克（H.v. Treitschke, 1834-1896）以及後來的徐培爾（H.v. Sybel, 1817-1895）等普魯士學派的史家，深受影響。稍後，邁涅克尊崇蘭克（L.v. Ranke, 1795-

1886)，以蘭克爲師，乃逐漸擺脫上述三位史家。最後證明，邁涅克靈感的主要來源是蘭克。而邁涅克可說是現代闡釋蘭克學說的史家中，極負盛名的一位。

德意志史學的傳統之中，有三個觀念占有重要的地位，即國家觀念，價值的哲學以及知識的理論。（註一）十九世紀以後，德意志的史家承認國家爲一本身有目的、且由自身原則所控制的個體；價值存在於具體的歷史環境之中，而表現於上帝意旨所散發出的文化現象中；在知識領域方面，他們反對概念化的思考，提倡直覺了解（Verstehen）。（註二）邁涅克亦接受此三個重要的觀念。然而所處時代不同，觀念上不免有所分歧。

蘭克成長於十九世紀初期，受到當時普魯士保守主義的影響，自滿於普魯士國家的現況，與現實政治隔閡甚大。特萊區克等人脫離蘭克的路線，積極地參予統一運動，以史學爲現實服務。邁涅克則生於帝國奠立後的承平時代，以爲前一輩的夢想已實現，而以更堅定的信心研究現狀。前後三代各具有不同的風格。

邁涅克接受蘭克以降的國家觀念，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與二十世紀初的和平時代中，他肯定俾斯麥的帝國在某種程度上已實現了他的理想國家：即國民國家（Nationalstaat）。此後隨時局的發展與變化，邁涅克於遭受時代的刺激之餘，却不能不修正他的國家觀念。換言之，國家對他而言，不只是歷史研究中的題目或是觀念，而且與實際上的國家有甚大的關聯。邁涅克自十

九世紀德意志歷史的研究中所獲得的成果，不僅是學術上的收穫，也是他用以判斷現實的標準。時勢的改變足以使他改變在研究歷史中的國家時所採取的角度和立場。探討他的國家觀念和他對時事的反應便是本文的主題。

本文以邁涅克的四本作品作為分期的依據，即「世界公民主義與國民國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1908)、「近世國家理性記」(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1924)、「歷史主義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1936)以及「德意志的災殃」(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1946)。來探討邁涅克在這些著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國家觀念的變遷和他本人對於現實問題的反應。

註釋

註 1 .. Georg 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7.

註 2 .. Ibid, pp. 8-10 .

第一章 邁涅克國民國家觀念的形成

第一節 邁涅克的生平

邁涅克於一八六二年十月三十日出生於北德、舊屬普魯士阿爾馬克區（Altmark）的小鎮薩爾滋威德（Salzwedel）。該鎮民風保守、淳樸。他的祖父自一八一一年即遷居於此，擔任郵政局長；一八五〇年之後由邁涅克的父親接任，直至一八七〇年。（註一）邁涅克可說是出身於中上的官僚家庭。家庭中宗教氣氛濃厚，音樂是全家日常的娛樂之一。邁涅克回憶說：「同樣的北德，新教，市民階層和忠於普魯士國家的信念培育了我。」（註二）而這種邁涅克稱為「基督教、日耳曼」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歡笑和樂於與人交往的態度。（註三）

一八七一年春，舉家遷往柏林。邁涅克親眼看到軍容壯盛的普魯士軍隊列隊通過凱旋門。俾斯麥和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留給他極端深刻的印象。

此後新帝國的首都柏林便成為他的家鄉，邁涅克也在此地接受中學教育（Gymnasium）。深受父親喜愛浪漫主義作品的影響，邁涅克在中學期間即喜歡研讀文學作品，夢想著有朝一日成

爲小說家。然而一八七八年因受洗一事與父親發生了爭執，以致於在宗教信仰方面與父親決裂，並且打破了他成爲小說家的夢想，轉而走向研究科學的方向。（註四）歷史課是邁涅克喜歡的課程之一，契爾默（Zelmer）的歷史課程給了他強烈的印象。（註五）普列格（J.Wil. Preger）的中古德意志神話史也是他熟讀的作品。（註六）歷史中最能吸引他的注意力的就是世界史中的「英雄」。（註七）

文學、歷史作品和他的宗教信仰息息相關，對他的成長有雙重的作用。文學和歷史的作品幫助他擺脫了教條式的宗教信仰；解脫後的宗教信仰更能幫助他領會文學和歷史作品中的理想和人的價值。但是中學結束時，邁涅克「並沒有嚴謹的思考，僅是由本性的引導，自當時運動的價值中作了某些選擇：自由思考，揉合了以理想解釋的需要，且以信仰權利爲傲。」（註八）但是他父親的「嚴謹的自我負責和良心檢討（Gewissensprüfung）的新教方式的感覺」（註九）仍然深深地影響了他。

一八八二年邁涅克進入了柏林大學。德洛依森（Joh. G. Droysen）的「歷史方法論與歷史百科全書」（*Methodologie und Enzyklopädie der Geschichte*）不僅給予邁涅克一些史學批判的基礎，更重要的是教導他以此方法作爲解開歷史中人性之謎的鎖匙。（註一〇）此外謝勒（Wil. Scherer）的德文法學（*Deutsche Grammatik*）、克希霍夫（A. Kirchhoff）

的希臘文學史亦是邁涅克所喜歡的文學課程。在這一學期，邁涅克亦聽過特萊區克（H. v. Treitschke）的演說，但其時並沒有被他所折服。（註一一）一八八三年四月底，邁涅克轉學至萊茵地區的波昂大學（Bonn），為時一年。這是他第一次離開普魯士國土。就在這一年邁涅克決定了以史學作為他專攻的科目，（註一二）他認為歷史研究較適合他的本性：

儘管我有強烈的形上學的需求，我從未想成為純粹的哲學家，因為我缺少鑽研抽象思想所需的執著性。為了滿足此項需求，我需要實體與精神的緊密的結合。而再也沒有其他的學科較史學的研究範圍更緊密的將兩者結合在一起了。（註一三）

一八八四年返回柏林大學，接受寇詰（R. Koser, 1852-1914）的指導，以十七世紀普魯士的歷史作為他的論文的範圍。一八八六年通過考試，題目是「所謂史特拉倫道夫的諫章與一六〇九年豫希利的繼承紛爭」。（註一四）邁涅克證明史特拉倫道夫的諫章應該是一六一〇年而不是一六〇九年提出的。（註一五）這篇論文主要是批判方法的練習和資料的學習，具有當時實證主義尋求盡可能精確和依據經驗的（empirisch）特徵。（註一六）

一八八六年畢業後，邁涅克至梅克倫堡（Mecklenburg）地區的一位大地主家當家庭教師，為時半年。這六個月的時光並未白費，邁涅克不僅重新肯定了他的宗教信仰，而且對狄爾泰（Wil. Dilthey, 1833-1911）有新的認識。在狄爾泰和德洛依森的影響之下，邁涅克選定了「

就其方法比較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作爲他參加國家考試的論文。（註一七）狄爾泰的「精神科學導論」也是他在這個時間所研讀過的文章，而個人的意志自由與嚴謹的因果關係之間的諸項問題就此存在他的腦中。（註一八）

一八八七年四月，以助理身份進入普魯士國家檔案局。在局長徐培爾（H. v. Sybel）的指導下，邁涅克的興趣逐漸轉移至現代史，且受到徐培爾的賞識。（註一九）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徐培爾問邁涅克是否願意爲波普元帥（Gen. v. Boyen, 1771-1848）與葛洛曼元帥（Gen. Grolman, 1777-1843）寫傳。邁涅克選擇波普元帥。（註二〇）此後十九世紀初期的普魯士改革時代成爲他專攻的範圍，或者如他所說的，成爲他的「思想的故鄉」。（註二一）

一八九〇年左右是邁涅克思想的「醞釀時期」，（註二二）特萊區克、德洛依森和徐培爾之外，邁涅克逐漸接近蘭克（L. v. Ranke）的著作，（註二三）以及洪保德（Wil. v. Humboldt, 1767-1835）的文章，如「試論國家權限的觀念」（Idee zu einem Versuch die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註二四）這個時期的邁涅克可以概稱爲屬於「古典性自由主義及理想主義的歷史主義的傳統。」（註二五）

一八八八年邁涅克參與「史學雜誌」（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編輯工作。（註二六）一八九三年徐培爾與當時的主編列曼（M. Lehmann, 1845-1929）決裂。列曼離開「史

學雜誌」之後，邁涅克代替了他的地位。邁涅克與徐培爾（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以及特萊區克（一八九五）合編，一八九六年之後，則由邁涅克獨自負責。（註二七）由於「史學雜誌」不受任何公家機關支持，主編擁有決定一切之權；徐培爾去世之後（一八九五年），雖成立了編輯委員會，但主編地位依舊。（註二八）此後邁涅克控制了「史學雜誌」，直到一九三五年為納粹份子排除為止，約四十年。「史學雜誌」在德國史學界能維持領導的地位，邁涅克的確功不可沒。

一八九五年秋，「波音元帥傳」第一卷完成，（註二九）邁涅克因此在一八九六年獲得大學任教的資格（Habilitation）。一八九九年，「波音元帥傳」第二卷出版，使他在兩年後，即一九〇一年被聘為史特拉斯堡大學（Strassburg）現代史的正教授。（註三〇）

一九〇一年對邁涅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年。口吃的毛病使他缺乏信心，一度考慮辭去大學教職，返回檔案局工作。（註三一）但是他也考慮到檔案局的工作會限制他未來的發展。邁涅克一來不願默默無聞，二則眼見檔案局的同事科勞斯克（Otto K. Krauske, 1859-1930）和與轍（Otto Hintze, 1861-1940）已應聘為教授，使得邁涅克亦渴望有所突破。（註三二）因此他毅然地接受史特拉斯堡大學的聘請。邁涅克以辛勤的工作克服了心理的障礙，他的講課不以文辭而以客觀、踏實取勝。（註三三）

邁涅克在史特拉斯堡大學擔任現代史教授，爲時六年，一九〇六年轉往佛萊堡大學（Freiburg）。邁涅克回憶他史特拉斯堡六年的經歷：

講課和專題討論帶給我新的問題，與其他科學的學者交流能無與倫比的刺激、擴大和加深我的研究意願（Das wissenschaftliche Wollen）。我在史特拉斯堡的經歷極豐富。一九〇七至一九三六年間我所出版的三本精神史的著作，其根源就是我在此所想到的，一部份是早已想透的主導思想，一部分則是興趣的轉移至那些嶄新的、有吸引力的、且至今我尚未接觸過的歷史生命的現象。（註三四）

但是不只是學術的刺激而已，個人的生活態度也受到影響。亞爾薩斯先前長期受到法國的統治，留下強烈的法國文化的影響，學風自由；史特拉斯堡、佛萊堡和海德堡等形成所謂的「萊茵上游的文化省」，與柏林的風氣極端不同。（註三五）正如邁涅克所說的，史特拉斯堡是「德法文化的鬥爭地（Kampfplatz）」。（註三六）在此，他雖有身處殖民地之感，但却有定居該地的打算。在此風氣衝擊之下，邁涅克說：「我的普魯士的本性並未喪失，但却更具有德意志的傾向。」（註三七）他在史特拉斯堡和佛萊堡的十四年時間並未白費，德意志的意識逐漸加強而壓抑了過分狹隘的普魯士意識。（註三八）

此外西南學派的大師溫德爾班（Wil. Windelband, 1848-1915）和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 的反實證主義的色彩和價值學說，以及前往外國，尤其是意大利的旅遊，皆對邁涅克有莫大的助益。馬基維里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的學說攫住了他：在如此美麗的世界中，一個倫理、道德和權力政治之間關係的嚴肅的問題，構成了一九二四年出版的「近世國家理論」一書中的中心主題。(註三九)

邁涅克對政治的關切始於一八九〇年代，至一八九五年稍為加強，主要是不滿於年輕的皇帝威廉二世。而造成不滿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對政局的觀察以及與檔案局同僚的討論，另一方面則是學術研究的成果：一八一九年改革者的改革遭到保守派的反對而失敗；使邁涅克逐漸反對普魯士的保守主義而接近瑙曼 (Fr. Naumann, 1860-1919)。(註四〇) 此種傾向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慢慢加強，終於使邁涅克與國民自由黨 (Nationalliberale Partei) 站在同一陣線。(註四一)

一九〇八年，邁涅克的成名作「世界公民主義與國民國家」(註四二) 出版了。這部以嶄新的方法，以「理念」來研究政治史的著作，不僅為史學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也奠定了邁涅克在史學界的地位，他成了政治理念史 (Politische Ideengeschichte) 的創始人。(註四三) 此書也同時表現出了邁涅克樂觀的政治態度，此留待下節討論。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邁涅克返回柏林，同時獲選為普魯士科學院

院士。不論就學術研究或是實際的經驗而言，邁涅克都有了新的發展機會。當然柏林大學崇高的學術地位對他有無比的吸引力。（註四四）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身處首都，也使邁涅克有了接觸到實際政治的機會。大戰初期他加入了「一九一四年德意志協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von 1914）」、「週三討論會」（Mittwoch-Gesellschaft），以及以戴爾布魯克（Hans Delbrück, 1849-1929）為首的「週三之夜」（Mittwoch-Abend）的集會，其中有學者，有政治家；戰局和政治的發展都是討論的主題。一九一五年七月，邁涅克在普魯士科學院就職演說中提出他的研究計劃：一方面研究自文藝復興以來權力政治之精神與本質的轉變，另一則是現代史觀的形成，而擬將二者合而為一，定名為「國家學與修史」（Staatskunst und Geschichtsschreibung）。（註四五）然而戰爭的意外發展迫使他改變初衷，不得不分別處理此二問題，「近世國家理性論」（一九二四年）（註四六）以及「歷史主義的形成」（一九三六年）（註四七），二書即是。戰爭的結果和德國政治的發展使邁涅克喪失了樂觀的看法，也使得此二著作帶有濃厚的時代色彩。

帝國戰敗，帝制瓦解，邁涅克成為威瑪共和的支持者，他由「內心的君主政體主義者」（Herzemonarchist）變成「理智的共和主義者」（Vernunftrepublikaner）。（註四八）他將歷史研究中所獲得的知識與對時代問題的關切結合，為鞏固共和政權而反抗危害到共和的

極左與極右分子。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mus）興起時，他的反抗呼聲却遭到漠視。邁涅克在一九二八年自柏林大學退休後仍然掌握著「史學雜誌」的編輯權，且被選為於一九二八年成立的「帝國歷史委員會（Die Historische Reichskommission）的主席。一九三五年，前者被剝奪，後者被解散，邁涅克成為手無寸鐵的遺老，只得閉門著書。「歷史主義的形成」以及一些討論歷史主義的文章皆在此間寫成，（註四九）同時也對蘭克的史觀加以闡釋且提出他自己的史觀。霍佛（W. Hofer）稱此期為邁涅克的歷史主義時期。（註五〇）

一九四五年戰爭甫結束，邁涅克即在物質環境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寫下他對十九世紀以來德國現代歷史的反省，此即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德意志的災殃」。（註五一）三年之間印刷四版，可見其受重視的程度。

此時邁涅克已八十五歲，眼疾惡化，身體衰弱，但仍繼續工作。一九四六年始，他恢復柏林大學的教職，在其私宅中與少數學生以專題討論的方式進行。（註五二）一九四八年邁涅克宣布放棄柏林大學的教職，轉而接受甫成立的柏林自由大學的教授和榮譽校長職位，繼續為自由而奮鬥。（註五三）直到一九五四年逝世，享年九十二。

邁涅克並非天才型的學者。一八八七年至一九〇一年的檔案局工作使他有極紮實的史料知識。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的教授生涯使他受到不同學風的衝擊。一九〇八年第一部大作出版時